

我第一次见到明洁是在十五年前一个仲春的上午。那天我去旁听她的专业选修课《社会语言学》——非常热门,没能抢到。在十点钟虚虚浮浮的日光中,她走进教室。长长的卷发、温柔的灰色系毛衣与长裙仿佛带着拖影,如此地优雅,并把这优雅与智慧举重若轻地化成了这样清澈犀利的讲述。后来,被语言学这门学科所深深打动的我理所当然地念了她的研究生。

评上教授之后的一日,她电话告诉我她要去印第安纳州访学一年。言罢动身,一如既往地干练。

她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和节奏。消息源源不断地传来,她总能在新的一处迅速发现最趣致的事物。她兴致盎然地告诉我那儿地方虽不大,却有排期密集、风格多样的音乐会和艺术节,每天晚上都有优质的演出可供选择。从性学到爵士乐,从早期殖民聚落到空想社会主义小镇,她寻访了诸多大师的踪迹。

出乎我的意料,除了一直所钟爱的人文艺术,她亦毫不犹豫投入北美壮丽的荒野,跟新朋友们一起去了国家公园野营。那些日子我甚爱看着她在发来的照片里斜斜倚着越野车发动机盖子、抑或坐在粗粝的帐篷前,长长卷发在夕阳下流动着闪烁的光芒,姿态那般地潇洒,仿佛黄金时代走来的女郎。我想这简直是必然的,智慧和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这世界的任何角落都是她可以放纵情怀的游乐场。那些艺术、那些学术,是头脑最好的游艺,而身体亦可以寻找到更广阔的地方去搁置。

既然动身,步履便不会再停。“道在道中”,唯投身道路方可寻觅真理。这不是容易的事。我听过很多人向我抱怨美国中小城市生活的无聊,更遑论书斋生涯,然而明洁凭着

一把对世间的清醒与热情,把那一年精耕细作如此灿烂夺目。

那些日子她开始不停地在国内报章上发表大篇幅的文章,与一般的游历记述不同,有见闻与资料、更有思考与明洁灵魂里那个独立自由的“我”。有一篇讲金赛的文章初名叫做《这世界谁在性的外头》。没有。自然没有人在

## 来时莫徘徊

魏梦晓

性的外头。但我更喜欢这个对“围城”意象难得的果断判断,不仅仅是性,她堪破了,便用这样的姿态投身于世界。去国并非为了远离,倒是一头扎进更大的天地,她从未把自己放在这世界外头。

我知道她向来喜欢打破所谓的“舒适区”。回国后她去了新的系所,转投了人类学,跨大学科的研究转向让我讶异之余简直要击节喝彩。她就像童话里的孩子,想要获得远方星星洒落的金子,转头便离开了悉心经营的精美花园,奔向辽阔的未知之地。新的社会科学写作和研究,有传统项目如访谈、写作,亦有活色生香如策展、直播。密密实实的田野工作填满了她的假期,尽管这让我们相聚的机会减少,但我无比乐见于她过得越来越神采飞扬,笔意越来越举重若轻,自然也存了小小私心——透过她轻盈的笔触,我得以更多地窥见这糟糕又精彩的世界。

故而这本书里不仅仅有早几年的北美之行,更有后来她探访香港重庆大厦里居民的秘辛、皮影戏在中美之间不为人知的交流史,她从语言学中走出来,把一身冷峻的学术功

底与一腔对世界的柔情涂满了天空。

最喜欢的是那一篇讲纽约涂鸦圣地的《东哈莱姆的见与证》,资料扎实、情味浓厚,我拿去跟我的计算机工程师先生细细讲述,他瞪大眼睛,“天呐!明洁居然敢去那种涂鸦遍地的社区访问还居停?果然世界需要知识分子。”这简直令我得意洋洋,好奇与关怀、勇气与智慧,人类学的田野之趣尽在于此。

俗世纷纷,一个人总需要有一个你所信赖的人带你用透彻的目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更不要说随着疆域的扩大,明洁越发地圆融,心境越发地澄澈。我的世界里,她还是在那儿。在那些咖啡店的下午,她对我讲起读的书与观的展,帮我厘清我凌乱的讲述,用刀锋般的寥寥数语帮我剖开生活中的疑惑。往昔优雅未损分毫,相反,因为带着几千公里外的灰尘,叠出了更丰厚的层次,像一块地道的法式拿破仑,越发地醇厚,回味弥深。

岁月种种川流不息,留下的记忆如晴空云雀般明亮。2018年初夏的一个午后,我们并肩在熟悉的武康路街头走过,她在清透的日光里嘱我写这篇序。诚惶诚恐接受任务之余,我又与她谈到了将来。我们都到了很多人认为不应该再对生活有过多幻想的时刻,但我们总是不可避免地继续规划将来——这对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来说,简直是一定的。

这么久以来,我已深深懂得,世间那些不明来由的潮水,最终将会把我们拍打到不知何处,但我们曾在此相聚。当我回头,当我向前时,总有那么一会儿,我会觉得,在那些裹挟着我们不断前行的滚滚洪流里,有透明的灵魂依旧被稳稳地托付于某个地方,依旧用力选择着自己的方向。(本文为李明洁著《那是风》之序,有删节。)

110年前的1909年,上海滩刮起一股霍元甲旋风。霍元甲,河北沧州人,传说青年时曾一人在山中砍樵,遇贼寇,以一对肉掌与10多人周旋,打得呼呼风响,数10回合,贼人无法近前,安然脱身。

霍元甲旋风来源于一个到中国走穴淘金的英国人奥皮音。据《虹口区志》记载:“1909年,西洋力士奥皮音在北四川路亚波罗影戏院表演臂力,口出轻蔑中国人之语言,翌日见于报端,沪人哗然。”奥皮音的确吆喝得有点过头,于是乎,霍元甲登场了。是年12月,霍元甲应邀赴沪挑战,奥皮音借口推托,双方相约次年4月在静安寺张园一战。吊足胃口的霍元之战自然是万众瞩目。岂料还没到关键时刻,那洋卖艺的哥们就怂了,落荒而逃。

霍元甲在报上刊登广告:“世讥我国为病夫国,我即病夫国中一病夫,愿与天下健者一试”,并宣称,“专收外国大力士,虽钢筋铁骨,无所懦焉。”此外,他还趁热打铁,办起了武术学堂。1910年,精武体操会成立,霍元甲是创始人。可惜的是,霍大侠招徒授艺仅仅70天,就意外患病而卒,年仅41岁。

1916年,精武体操会迁到了惠民路375弄,更名为上海精武体育会,宗旨为“倡固有之国术,树体育之风声,并附正当之游艺”。顺便说一下,“体育”是个外来词,早期与“体操”并存混用,1910年代逐步统一规范到现代意义上的“体育”概念。据说,中国最早的体育团体是1906年上海创办的沪西士商体育会,而上海精武体育会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大最具影响的民间体育组织。

惠民路,西起杨树浦路,东至兰州路,跨虹口、杨浦两区。杨树浦路至大连路段属于虹口区,大连路至兰州路段属于杨浦区。惠民路早年称作“倍开尔路”,1943年改今名。前些年,惠民路改造拓宽,作为上海精武体育会旧址的4幢洋房面临拆迁之忧,不过所幸最后还是整体保留了下来。4幢西班牙式花园洋房中的3幢为同一式样的灰色洋房,另1幢为白色。每幢洋房都是两层半的砖木结构,二楼正厅两扇2米高的木框门上镶嵌有中世纪哥特式风格的彩色玻璃,三楼设有露台。

不知怎么的,在惠民路上散步,脑子里忽然跳出了老舍先生的小说名《断魂枪》:

夜静人稀,沙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64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

真得感谢霍大侠,他把不传的中国武术秘诀嫁上了西方体育运动概念,惠及大众。当然,现在的体育观念和当年霍大侠的时代又有所不同。科技之更迭,但把天堑变通途,早上上班,出门坐车,上楼乘电梯,周而复始,结果就是体检时被医生吓着了。穿白大褂的同志语重心长地教育,如果再不做些适量的体育运动,你的脂肪肝就很难逆转了,适量运动就是每天至少散步一小时。小巷不在,精武门依旧。

掉队就没机会了。”

赶紧给他加油:

“这倒是真的,优秀始终习惯,小时候最关

键。”没想到他接着叹口气,说:“也不能太优秀,太优秀了父母吃苦。”

忙问他为啥,他说他家楼上住着老两口,儿子从小就是学霸,大学毕业了去国外读研,拿到博士就留下了,人人都夸他爸妈培养得好,可就是难得回来,两三

年才见一面。他家楼下不一样,生了个女儿,小时候学习不怎么样,高中毕业就工作了。后来嫁了个挺朴实的工人,就住在爸妈附近,天天带着外孙回娘家吃饭,粗活重活儿都被女婿收拾得干干净净。

“你说那儿子有啥用?哪像有闺女这家,老老小小有滋有味,咱老百姓不就图个热乎日子!”

真是朴实的出租车师傅,30年,不知拉了多少客人,沉淀出最基础的生活观。忙忙碌碌的中国人,各有各的甘苦,进退同样海阔天空,能这样活着,也是一种幸福。



## 以生物学家的眼光看文化

徐自豪

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夜晚,旧书拍卖网站上出现了一件手稿,百十来页的几个章节,有篇名而未见作者署名,首页中缝基本呈断裂状,还有被水浸泡的痕迹。这份稿子的用纸很普通,可字里行间扑面而来的大家气象,默默地显示这肯定不是俗手的文章。稿子的作者正是胡先骕先生,这是他一九四五年发表的巨著《中华民族之改造》的前六章节,据全文共有三十八个章节。比对已发表部分,与手稿内容基本一致。虽然边款漫漶,但还是有几页稿纸的边缘,清晰地印有“静生生物调查所”字样。

胡先骕,植物学家和教育家,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创办人之一。他发起筹建中国植物学会。他曾

陈寅恪教授曾告诫历史学者:“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那么请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与历史人物一起经历其事”。

过去的一二百年间,中国闭关锁国、积弱积贫,外强接连入侵,为了救亡图存,为了挽救被压抑的中华文化,有识之士们开始思考如何改进民族素质,恢复昌盛。胡先骕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黄萍荪《编辑后记》中记载:“作者以生物学家的眼光来解剖这一民族,从生理构造说起,一直谈到文化发展的程度为止。”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发表的《中华民族之改造·绪论》中,胡先骕先生写道:“西方之文艺复兴时代,不过与有明中叶相当,距今只四百五十年耳。四百五十年,在人类五十万年历史中,不过一弹指顷,在中华民族四千六百余年之历史中,不过十分



西游记 (中国画) 朱新昌

之一之短短时代,安知再过四百五十年,中华民族不能领导世界走上更高尚更优美之文明之路乎?此则吾人所以不可自馁而改造中华民族所以不可缓也。”

了解本民族过往的历史,

不断地改过迁善,这也

是胡先骕先生留给今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从中国科大打的去合肥南站,每周一次,熟悉而亲切。今天的师傅五十多岁,开出租车三十年了。看窗外幢幢高楼,他感叹变化大,房价高,现在城里好地段的房子,每平米都快两万了。他嘴上说着难,神情却笑呵呵的。提起小日子,他说儿子做小买卖,孙子上小学五年级,成绩特别好。“我经常对孙子说,千万别放松,学习好一定要好下去,不能半截子停下来,一

终身为父。知识、学问、品德、修养、能力等,和年龄并不成正比。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恩师,不管年龄大小,都要终身予以尊重。

2019年4月12日,童兵老师一行来到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就马克思

## 我们曾经这样称呼老师

杨秀国

主义新闻观教育进行交流。我是复旦的毕业生。母校的老师们来了,我自然要接待和作陪。童兵老师,那可是新闻传播学界的“大咖”。但我觉得,对于母校的老师,称呼越自然、越亲切越好。童兵老师没有教过我,我们也没怎么见过面。尽管如此,我们却神交已久。我在发言中,讲到了我和童老师的三个“接近点”或称“关联点”。

我说道:童老师应该属马,我也属马。看到童老师身体这么棒,精神状态

这么好,我萌生了一个心愿:12年后的我,能像现在的童老师一样。我要按照这个目标去努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童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先生的博士生,我的同班同学高冠钢是复旦大学王中先生的博士生。你们同为改革开

拓者,声名远播。河北大学新闻学院的发展和提高,离不开复旦大学等名校的帮助和支持。正因如此,我与母校老师们交往的机会也多了起来。见面较多的,是廖圣清老师。廖老师来河大当过答辩主席,作过学术报告,还曾带领河大的研究生到雄安新区实地考察和调研。尽管廖圣清学术成就不小,但年龄却比我小很多。自然而然,我们就以“师兄”“师弟”相称。每次见面,先是握手、拥抱,再是聊天叙家常。直到现在,我们还在手机的“运动健康”上相互点赞。

称呼,是小事,也是大事。在很多场合、很多情况下,不称官衔、学衔的称呼,更透着亲切、亲近。我与复旦新闻学院老师们称呼上的几件事,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复旦的情怀、包容和讲求实际、不务虚名的精神。

### 十日谈

我与复旦新闻馆

责编:徐婉青

把学习作为一种终身追求。